



白马 书系·教学津逮

现代语文 二十家

赵志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现代语文
二十家

赵志伟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语文二十家 / 赵志伟著.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9.5

(白马湖书系)

ISBN 978-7-5444-7105-3

I. ①现… II. ①赵… III. ①汉语—教育史—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H19-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87844 号



责任编辑 易英华

封面设计 陈芸

现代语文二十家
赵志伟 著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官 网 www.seph.com.cn
地 址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 编 200031
印 刷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16.5 印张 插页 2
字 数 235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4-7105-3/G·5852
定 价 49.00 元

如发现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本社调换 电话:021-64377165

自序

在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作为基础的母语教育也经历了由传统文言文教育到白话文教育的转轨,由传统私塾教学到现代学校课堂制的转变。这期间,有许多多学贯中西的硕学宿儒参与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建设:统一国语运动、设立课程标准、编写国文国语教材、引进教学方法、探讨语文教学要旨、文白之争、读经运动的讨论、语文学科中进行科学实验、办语文刊物……从清末民初到20世纪40年代末,这些前辈为了中国教育,为了唤醒民众,他们筚路蓝缕,数十年如一日,甚至在战争动乱的岁月里仍然没有停下脚步,把语文教学建立成一门成熟的学科,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如果没有战争动乱,相信我们的母语教育应该已经有了自己成熟的体系。这些名家中有梁启超、胡适、黎锦熙、吕思勉、钱基博、王森然、叶圣陶、夏丏尊、朱自清、阮真等,这些人“虽其立场不同,主张各异,而其势至重,其响至捷,其任皆艰且巨矣……虽不伦不类,言论主张,极相触忤;而其学问人品,皆有其长可取”。^①

这几年,我在阅读这些名家关于语文的一些论述时,也有这样的感慨:这些20世纪前期的语文教育大家的出身、经历、立场、观点或相同或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样的:由于时代原因,他们的学养深厚,不少人学贯中西,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企及的。还有就是他们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对于母语的教育倾注了巨大热情,他们为改革语文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为振兴民族、

^①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04.

国家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拳拳之心让后人钦佩。这种精神和业绩,是应该得到我们后人的肯定和尊重的。我们应该去研究他们的思想、理论、经验,给予恰当的评价。近年来,相关的著作已经有了不少,但是我认为还不够。时间已经到了 21 世纪,回头看看这些大家的著述,对于我们吸收前人思想资源,建设新的语文教育理论体系,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效率实在是非常必要的。我们不但要学习外国先进教育教学理论和经验,而且同样要学习本国的经验,因为汉语教育有她的特殊性,唯有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20 世纪前期这些语文教育家的著述,有的仍然对我们有指导意义,需要我们来学习,如黎锦熙、夏丏尊、叶圣陶、朱自清的阅读和写作指导、教材选编经验;有的需要在科学发展新形势下进一步研究,如吕思勉、郭绍虞为汉语、汉字的辩护,穆济波关于课程标准的研究;有的是从继承传统角度迫切需要解决的,如蒋伯潜、王森然关于教师进修问题,关于从学生实际出发的论述;有的时过境迁,需要重新进行研究和评估,如钱基博、陈柱关于文言文教学、关于国学的一些看法,陈望道关于“大众语”“汉字拉丁化”的见解;有的还需要发扬光大,如艾伟的从心理学角度对汉字问题、阅读问题的科学研究,阮真对于语文教育整体的研究,郭绍虞选编大学国文教材和教学参考书的经验等。

对于这些名家,我们应该本着知人论世、“了解的同情”的态度去阅读、整理、研究和学习。我们既不能盲目拜倒在前人脚下,不加分辨地照搬,就像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社会上有人因为不满意现在的语文教学,就以为以前什么都好,有一种盲目崇拜心理;也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以为前人做的只是一些经验总结,缺乏科学研究的高度;好像语文教育的科研是近来才有的,不是从这些前辈开始的。这种现象在我们所谓“圈内人”中比较多见。殊不知艾伟关于汉字、关于阅读的科学研究远比今日一批专家的研究专业性更强,科学性更高;阮真的问卷调查科学分析远比我们现在开展得早,研究得全面;更不必说叶圣陶、朱自清关于精读、略读思想,夏丏尊、黎锦熙关于作文教学的思想,至今仍然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近几十年来的各种语文教学改革、理论建设看起来轰轰烈烈,究其实,不

过是换了一些新名词,发出了一些不同的声音,并没有很大的突破,也没有产生什么新思想。国外引进的也有扞格不通的,国内自创的有时连逻辑也不通,遑论其他。所以对于语文教学,社会诟病之声不绝于耳。

笔者在大学里执教语文教学研究课程,经常被其他专业教师质问,为何语文会变成如今局面?我无语。我觉得语文教学现在问题很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无视语文教育传统,不从教师专业素养出发是诸多原因之一,这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我们也有培养教师的种种措施,但是,只要稍稍了解一下我们大学中文系的课程,以及教学、学生的学习情况,了解一些中学语文教师的生存情况,就不会对语文教师的未来发展有很高的期待。所以,我认为提高语文教学效率关键在教师,语文教师的成长当务之急是从传统入手,从提高自己基本功上努力,而不是搞各种各样的花架子。孟子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否则,如果一个语文教师连文言文断句都有困难的话,谈什么“文言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如果一个语文教师连背二十首唐诗都有困难的话,谈什么“诗词鉴赏”?如果一个语文教师连朱自清、郁达夫的行状也搞不清楚,谈什么对《背影》《故都的秋》的分析解读?所以,先要了解我们过去那些人是怎么做国文教师的,他们是怎么打底子的,他们是怎么研究语文和语文教学的,才能对自己的未来有一个好的规划。再进一步,我们要做的是了解语文教学经历过一些什么事,出现过一些什么人,他们有些什么见解,这样,才可以知道自己究竟应该读些什么,做些什么。“文化思想之革进,绝类递燃之火线:先启其机,后承以进,莫为之前,何从而革?且当时为新,过时即旧,今笑昔为旧,后亦目今非新。故仅可谓文化思想之演变,有疾徐衰旺;若妄讥前者为不进为无价值,则大谬不然。”^①

本着让年轻的大学生、研究生了解语文教育历史这样的指导思想,我把自己这几年上课讲的内容、发表的文章整理出二十篇,主要以语文教育名家个人经历、论述为主,略加评点,以供对语文教学和语文教育历史有兴趣的大学生、

^① 王森然.近代名家评传:初集[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408.

中学教师阅读。当然由于大多是一些“述而不作”的史料介绍，这样的文字仍然是教材性质的，所以不敢称著述。

王森然先生在《近代二十家评传》的自序里谈到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时说：“今日之社会，乃一黑暗卑污暴乱衰颓之社会。上自国政，下及民生，无分公家事业，及私人行为，映于目闻于耳者，无不令人震惊迷惘失望伤怀。”然而，“数十年间，海内才智有志之士，虽多沉溺政潮，颓废以终，然魁异奇桀志行皎然，数十年如一日，学问气节，足为一代青年范者，不无其人。”所以，他要为这个浊世中的这些硕学宿儒作一评传，让中国学术有所弘扬，使天下学子可以效仿。时代不同了，我们现在的条件比前辈好多了，但是我们的精神是不是能够像他们那样呢？我不敢妄下断语。取这样的书名有窃攀前贤之嫌，但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是为序。

赵志伟

2016年10月

目 录

但开风气不为师 ——胡适论国文教学 1
以涵牛之鼎烹小鲜 ——梁启超的《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 18
白话文教学早期研究第一人 ——何仲英 31
“语文建设”的先行者 ——陈望道的语文教育思想 48
“其功不在禹下也” ——黎锦熙和现代语文教育 64
“国文国语教学改革运动的陈胜吴广” ——吴研因《小学国语教学法概要》评述 79
“好诗千首课儿徒” ——王森然及其《中学国文教学概要》 93
百战老卒,行伍出身 ——阮真《中学国文各学程教学研究》和《中学国文教学法》 106
科学精神,淑世事业 ——艾伟和他的国文教学心理学方面之研究 118

“道尔顿制实验”和“大语文教学观” ——穆济波的国文教学研究 132
详述主张,深入讨论 ——张震南及其《中学国文述教》 139
国学家的“野人之曝” ——胡怀琛的《中学国文教学问题》及其启示 149
“平心静气,逐一检讨” ——蒋伯潜语文教学思想 157
语文教学须“祛弊” ——吕思勉论国文教学 169
“以法施人 念及童蒙” ——钱基博的语文教学思想及其启示 181
当知读书之法,当明取舍权衡 ——陈柱的国文教学思想简介 194
详细地照隅隙 ——郭绍虞国文教育思想评述 207
“嚼饭哺人”好向导 ——朱自清与国文教学 221
此风永发扬,厥绩宜炳蔚 ——谈叶圣陶的淑世、济世精神 234
“开明精神”传“文心” ——夏丏尊语文教育思想 242
后记 255

但开风气不为师

——胡适论国文教学

讨论研究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发展,胡适(1891—1962)是位绕不开的人物,但是,一般人都知道胡适在思想史、哲学史、文学研究方面的成绩,对他在国文教育领域里的成就却所知甚少。研究语文教育的大多知道他的《中学国文的教授》(1920)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1922)。但是仅此而已,以为他是一个客串的角色。其实,他是一位现代语文教育的改革家,早在留学美国期间就已经关注国语国文教育问题。他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影响极大,对现代语文的建设十分关注:对文字改革、国语推广和中学国文教学的课程纲要、标准的制订、教材的编写发表过不少真知灼见,还参与了 1923 年高中国文课程标准的制订。虽然他自谦是国文教学的“门外汉”,而事实上他是一位真正的语文教育改革家。他和鲁迅有相通之处,即想用文字改革、国语运动来推动普通民众的教育,他们都反对尊孔读经。只是,胡适在批判的同时,更多地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这些意见在当时影响很大,在今天仍然有价值。

一、被“逼上梁山”——从事语文改革之动因

据胡适《四十自述》里的说法,他参与“新文化运动”,写了一系列影响很大的文章其实是被“逼上梁山”。后来他对唐德刚说:“我原来是个保守分子,被

众人所迫而走上了对中国语文作激进改革的道路。”^①其实与其说他是被“逼上梁山”，倒不如说他从幼年起就有改革中国语文的素志。

胡适幼年就读于家乡徽州，除了蒙学以外，他读了不少古白话小说，据王森然说：胡适三岁即启蒙，受业于叔父胡玠，读蒙学和“四书五经”，“先生九岁时，即喜读小说，如《水浒传》《三国演义》《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剑十三侠》《双珠凤》《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经国美谈》《琵琶记》《夜雨秋灯录》《夜谭随录》《兰苕馆外史》《寄园寄所寄》《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妆楼》《虞初新志》等，均此时所最嗜者，其白话文字之训练，亦于此时养成”。^② 这经历和周作人、朱光潜等类似，可以说正是这经历，决定了他一生对中小学生学习国文的态度——提倡读小说。1904年他入上海梅溪学堂，翌年入澄衷学堂读书，1906年考入中国公学，参与编辑《竞业旬报》。1908年参与组织成立中国新公学，并被聘为教员，任教低年级英文。1910年2月任华童公学国文教员，7月考取“清华学校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官费生”。当年夏天和赵元任等一起赴美留学，进入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因志不在此，改学文科。1914年与任鸿隽、杨杏佛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旨在提倡科学传播知识，宣传实业救国。1915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专攻哲学。

胡适留美七年，虽身居国外却心系祖国，对于内忧外患、“五鬼闹中华”的局面，深致忧虑，矢志以教育救国。在给友人许怡荪的信中说，“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③ 1916年撰《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于1917年1月的《新青年》，提倡文学革命，提出“八不主义”，主张以白话代替文言，成为“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之一。他在

① 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唐德刚, 译注.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138.

② 王森然. 近代名家评传: 初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350.

③ 胡适: 胡适留学日记: 下[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180.

留学期间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教学改革改良做了充分的准备。从《藏晖室札记》所载有关国文国语教育的文章,就有以下诸篇:1.《一种实地试验之国文教授法》(1914年2月9日);2.《记兴趣》(1914年7月16日);3.《演说之道》(1914年10月30日);4.《专精与博学》(1914年11月10日);5.《为学要能广大又能高深》(1915年2月4日);6.《如何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1915年);7.《伊丽鹗论教育宜注重官能之训练》(1916年3月6日);8.《作文不讲文法之害》(1916年4月19日);9.《复朱经农》(1916年7月);10.《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1916年7月6日);11.《发表与吸收》(1916年11月)。这些是写成文章的,还有许多未形成文章的记录。

在胡适的《藏晖室札记》里有关中国语言文字、音韵、训诂、诗词格律、小说的阅读札记,所在皆是;对古代文章、近人文章的评析辩驳也很多,如对章太炎、梁启超一些文章的讨论。还有和好朋友赵元任、朱经农兄弟、任鸿隽等讨论文言白话的信件往来等。他还训练自己的演讲。他说:“公开讲演也是个最好的机会,让一个人去训练他自己的写作;训练他作笔记的系统化。这些种不同形式的表达方法可以强迫一个人,对一项命题去组织他的感想、观念和知识;这样可使他以写作的方式,对他要表达的题目了解得更清楚。所以我对公开讲演的好处,曾撰一简单的格言来加以概括。这个格言就是:要使你所得印象变成你自己的,最有效的法子记录或表现成文章。”^①这些都是他的准备工作。他在《四十自述》里讲过一个故事:他每月要收到一张自华盛顿清华学生监督处寄来的支票。同时这个信封里总是夹有一张传单,里面有宣传废除汉字、改用拼音等内容。他开始很不屑,觉得那些宣传的人既不懂汉字又不能写汉字,谈什么废汉字。后来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对待人家,于是想到自己和赵元任这样有能力的人应该为使中国语言文字教育更容易教学,而做一些事情。后来他同唐德刚谈及此事:“这是1915年的夏天。那年秋季我就从康乃尔转学到哥伦比亚去了。因而从这次开始之后,以后两年我致力于语文改革

^① 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唐德刚,译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3.

的工作,也就是我在哥大学生生活中的一部分。”^①所以说,当他在《新青年》发文章时,已经胸有成竹了。

“五四”前后,胡适发表了更多有关语文教育的文章。除了《中学国文的教授》(1920)和《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1922)以外,还有:1.《答黄觉僧君“折中的文学革命论”》(1918);2.《复朱我农》(1918);3.《答盛兆熊》(1918);4.《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1918);5.《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1920);6.《答汪懋祖》(1921);7.《治国学杂话》(1923,即《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附录二);8.《国语运动和文学》(1922);9.《赵元任国语留声片序》(1922);10.《读书》(1925)。

除了写文章以外,胡适还参与国语运动。为了进一步推广国语,使国语成为全民通用的工具,由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教育部附设的国语统一筹备会于1919年成立,当时会长是张一麐,副会长是袁希涛和吴稚晖,蔡元培、黎锦熙、赵元任、胡适、周作人等都是会员。后来胡适说:“在北大我也被介绍认识了当时教育部主办的‘国语统一筹备会’里的一批文学改革家。这些改革家都是一些有训练的传统学者,缺少现代语文的训练。但是他们都有志于语文改革;对‘语文一致’的问题,皆有兴趣。‘语文一致’的意思就是把口语和文学,合二为一。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很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就只有根本放弃那个死文字,而专用活的白话和语体。”^②但是,可以做教材的“标准国语”在哪里?这是当时一批老先生苦恼的事。胡适认为:“要有‘标准国语’,必须先有用这种语言所写的第一流文学。所谓字典标准是不可能存在的。没有人会先去查国语字典,然后才动笔去写作——去写故事、小说、催眠曲或情歌。标准原是一些不朽的小说所订立的;现在和将来也还要这些伟大作品来加以肯定。”^③为改革国文教学他还做了许多事,例如1923年他还参与了中学国文国语课程标准的制订,把自己的许多设想付诸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

① 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唐德刚,译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40.

② 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唐德刚,译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62.

③ 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唐德刚,译注.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62.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是白话文已经在中小学课堂站稳脚跟,胡适的希望已经变成现实;二是胡适的治学兴趣转移到其他方面。因此,胡适谈国文教育的文章就比较少了。但是还有几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1934)、《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1935)、《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1935)。唐德刚在评论胡适在这方面的成绩时,并不太同意胡适是被“逼上梁山”的说法,而说他是自愿上这座“山”的。唐氏评论说:“正因为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是空前的,他在近六十年来我国的‘文字改革’以及‘拉丁化’运动中的影响也是至深且巨的,因为语文改革运动在近代中国原来也就是白话文运动的附庸。所以,胡氏的言论也就是直接地影响了近五十年来左右两派学人对整个语文改革运动的主张。”^①胡适对国文国语的教学有很深的研究。他要把语文作为教育民众的一种工具。他们这一代人都有一种使命感,觉得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使国家强大,国家强大必须依赖人民的觉醒,而教育必须先行。科学救国也罢,实业救国也罢,首先需要人民受教育、有文化,而中国的语言文字(文言文)是普通百姓学习的一个工具。胡适是这种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一些主张根本目的是希望改革中国的语文,使之能够更有效地让普通百姓学会掌握,这样普通人也能够接受教育,能够读书和写作。林语堂在论鲁迅时说鲁迅有一种“大心肠”,如果说鲁迅志在摧毁一个旧世界,是一种给人棒喝使人醒悟的做法;那胡适就是志在建立一个新世界,是一种普度众生的慈悲心肠。

二、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关注国语教学目标的确定

(一) 主张建立国语作为一种工具

胡适在他的《建设的革命文学论》一文中说:“我们今日提倡国语的文学,是有意的主张。要使国语成为‘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有标准的

^① 唐德刚. 胡适杂忆[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28.

国语。”过去我们都是从新文学角度看待这句话的。如果我们从语文教育角度看,那么反对旧文化、建设新文学就不仅仅是一个文学问题,它是为提倡科学与民主、唤醒民众服务的。在胡适看来,民众没有文化是因为汉字和古文太难了。1915年,他在《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里说:“汉文问题之中心在于‘汉文究可为传授教育之利器否’问题。”他认为文言有四弊:1. 文言乃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白话文字法教之;2. 文言乃视官文字非听官文字,学者不独须强记字音,又须强记字义,是事倍而功半也。3. 吾国文本有文法,而古来从未以文法教授国文。4. 吾国向不用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这是从技术层面讲的。另外他认为中国的古文是为贵族服务的,是同科举联系在一起的,“古文不但作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① 所以,过去能够受教育是极少数人的权利。现在科举废除了,国语文学兴起来了,中国语言和文字应该成为人人都可以掌握的工具。1916年6月,他发表了《白话文言之优劣比较》,用进化论观点提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活的白话必然替代死的文言而成为国语工具。这些观点曾经引起他的朋友朱经农的反对。为此,胡适还作了澄清:“你所说的‘死’,和我所说的‘死’,不是一件事。我也承认《左传》《史记》在文学史上,有‘长生不死’的位置。但这种文学是少数懂得文言的人的私有物,对于一般通俗社会便同‘死’的一样。”^②到晚年,他和唐德刚谈话时还是这个意见。

(二) 提出了国语教育的目标

1920年,教育部颁布法令将全国各国民学校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到4月又发通告分批废止以前的国文教科书,其他各种教科书也相应改用语体文。在这样一个转轨时期,一些中学教师和各类人物对此还不习惯,一些学校纷纷请名家去做演讲。当时教育部还开办国语讲习所。同年3月24日,胡适应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国文研究部之邀发表了演讲,题目是“中学国文

① 胡适. 白话文学史[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0.

② 胡适. 胡适文存:1[M]. 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72.

的教授”。1922年10月,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召开第一届年会,胡适又以同样内容讲演一次,题目改成“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有关中学国文教学的许多具体主张,主要体现在这两次讲演中。

关于国语教学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是胡适考虑得比较多的,他认为语文学科的本质是它的工具性和应用性。它不是文学而是文学的载体和工具,它也不是语言文字学,而是语言文字学的应用。他要用国语作为教育的工具从事社会教育。所以建设这个工具学科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教育大众,此与他提倡的“新文化运动”的宗旨是一致的。他在《中学国文的教授》讲演时,提出了国文教学的四条目标与标准:1. 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讲、讲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的错误;2. 人人能看平易的古文书籍,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之类;3. 人人能作文法通顺的古文;4. 人人能有懂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确立国语作为中学语文的基本课程,而不是旧时代文言一统天下的局面。这也就是胡适一直提倡要把《红楼梦》《水浒传》作为国文教材的原因。对这四个目标,后来胡适在《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讲演里又做了三条补充。第一,他认为国语是一个中学生“自由发表思想的工具”,中学生必须首先掌握好,所以能作国语文应是第一个标准;第二,要待“国语通顺之后方可添授古文,使学生渐渐能看古书能用古书”,“先学习国语到了明白通顺的程度,然后再去学习古文,所谓事半功倍,自然容易得多。学外国文也是如此,先学好了一种欧洲语言,然后再去学第二种,必定容易得多”。这里明显是有他个人经验在里面。第三,作古文只是看作实习文法的工具,不看作中学国文的目的。他认为在短时间内很难希望学生能够作长篇的古文,即使能作,也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同意黎锦熙的意见,中学的作文仍然以国语文为主。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学国文的教授》中,他提出的第四条标准:人人能有懂一点古文文学的机会。这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就是考虑到中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兴趣,学习文科有兴趣,所以定了这个标准。1923年胡适参与制订的《新学制课程标准高级中学公共必修的国语课程纲要》

和《高级中学第一组必修的特设国文课程纲要》里,就针对两种不同学生设计了不同的课程要求。其中“特设课程”,还包括了“文字学引论”和“中国文学史引论”那样比较深的课程,说明胡适的考虑还是非常周到的。

(三) 提出国语教育工具建设的方向

国语建设要向标准化和规范化努力,这是胡适的一个重要思想。1920年,教育部颁布命令,要求国民学校国文教科书用国语以后,当时有人提出要教育部先定个标准,实际是对这个法令不满。对此,胡适在《国语讲习所同学录·序》里做了阐述:“国语的标准决不是教育部定得出来的,也决不是少数研究国语的团体定得出来的,更不是在一个短小时内定得出来的。我们如果考察欧洲近世各国国语的历史,我们应该知道没有一种国语是先定了标准才发生的;没有一国不是先有了国语然后有所谓‘标准’的。”^①所以他提出的办法是第一步在众多方言中选定一种接近国语的方言作为“候补国语”,通过建设提高,使其逐步成为标准化与规范化的正式国语。但是这里“必须先有两种资格,方才能够变成正式的国语。第一,这一种方言,在多种方言之中,通行最广;第二,这一种方言,在多种方言中,产生的文学最多”。

胡适认为近代中国国语运动中所提倡的“官话”“普通话”便是具有这两种资格的“一种通行最广最远,又具有一千年的文学的方言”。所以已经被公认为中国国语的唯一候选者。而在国语教育运动中又把它作为语文教育工具定为全国学校教科书的用语。但是胡适认为这个“国语”还只是一种须待规范化、标准化的“候补国语”。因此,国语和国语教育工具建设的任务便是在实践中通过改革,逐步实现国语这个工具的规范化与标准化。为了达到这一目标,需要做很多工作。其中包括:一是文字规范化,二是语音规范化,三是标点符号规范化,四是国语语法规则规范化,五是国语文教材规范化。这最后一项,需要有第一流的国语文学作品,才有可能为学校建立“真正有功效有势力的国语教科书”。这五项工作做成了,才是国语教育成功的保障。其中文法一条,胡适特别

^① 胡适. 胡适文存: 1[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3: 161 - 162.